

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

蔡盛琦

摘要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統治後，日語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戰後隨著政權的轉移，進入一個新的歷程，民眾首先面臨到語言文字轉換的問題；剛開始由於對祖國的冀望與憧憬，於是將這股熱情反應在學國語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從城市到鄉村隨處可見國語補習班的招牌林立。為了順應這些學習者的需求，市面上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讀本、學習教材，本文探討的即是在這段國語熱潮期所出版的國語讀本；這些讀本各具特色：一、大部分讀本是以日文編訂；二、每種讀本的標音方法各異，有注音符號標音、老式四角標調法標音、日文標音、羅馬拼音等；三、過去熱銷的漢文讀本又重新編排印刷出版；四、重拾方言來學國語，因此不少讀本是以方言音對照國語音出版。由於許多讀本是中、日文並陳，國語、方言對照，它充分展現一個社會多元語言的轉換期，因此格外具有時代的意義。

然而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學習國語的熱情並未持續太久，即因民眾對接收人員不滿情緒高漲下不願再學國語，再加上臺灣一直處於國語師資缺乏、國語書籍缺乏的窘狀下，許多人根本弄不清何謂標準國語？國語熱潮的消退，國語運動由官方機構接手推動，臺灣社會走過這短暫多元語言文字並陳的時代。

一、前言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統治後，日語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戰後隨著政權的轉移，進入一個新的歷程，民衆首先面臨到語言文字轉換的問題；一開始由於對祖國的冀望與憧憬，將語言的認同與恢復民族精神兩者之間劃上等號，於是將這股熱情反應在學習國語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爲了順應學習者的需求，市面上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讀本、學習教材，這些出版品往往中、日文並陳，國語、方言對照，展現一個多重語言文化的轉換期，而它的內容又建構著當時社會知識的趨向，因此格外具有時代的意義。

本文想探討的即是這段學習國語熱潮期間所出版的讀本有哪些？這些讀本的編訂方式爲何？內容又包括些什麼？何以這段學習熱潮持續沒多久即快速的消失？過去對此問題的相關研究，多關注於國語問題，如許雪姬的〈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1]文中認爲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有其相當複雜性的背景與經過，起先是1946年10月25日起廢止日文版的報紙、雜誌，在二二八事件後，又禁止使用日語，將說日語、寫日文看成「奴化」象徵，將不通國語、不懂國文，變成不能擔任高等職位的理由，這一連串的措施將語文問題泛政治化；黃英哲的〈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2]，探討戰後臺灣國語運動的執行過程，及語言學家魏建功在此國語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李西勳的〈臺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3]，則是詳敘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相關碩論研究有史穎君的〈我國國語運動之研究1912-1981〉、夏金英的〈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李良熙的〈臺灣光復後推行國語教育問題研究〉、志村雅久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推行國語運動之研究〉、陳美如的〈臺灣光復後語文教育之研究〉等等，^[4]這些論述主要集中在官方推行國語的過程、

^[1]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1991.12），頁155-184。

^[2]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2005.10），頁79-107。

^[3] 李西勳，〈臺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臺灣文獻》，46：3（1995.9），頁173-208

^[4] 史穎君，「我國國語運動之研究1912-198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李良熙，「臺灣光復後推行國語教育問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1980）。志村雅久，「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推行國語運動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陳美如，「臺灣光復後語文教育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官方政策頒布、國語推行運動等議題，並檢討國語運動推行的成果與阻礙；與國語出版品相關論述，偏重在教科書的探討，有何力友的〈戰後初期臺灣國民學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館編《臺灣光復初期出版品書目（1945-1949）》為例〉、〈教科書供應模式對戰後初期臺灣文教事業之影響（1945-1949）〉，^[5]分別討論國民學校教科書的分類統計，與教科書之供應政策、流通管道、配發機制；而姚榮松的〈從蘭記語文圖書看光復初期雙語並存的榮景〉^[6]一文探討的是嘉義蘭記書局出版的《初學必需漢文讀本》，是少數專門探討戰後初期國語讀本的論述。

國語讀本是見證戰後臺灣社會文化銜承轉化的重要資料，但是這些讀本除了本身印刷及紙質不良，保存不易外；也因戰後對日文圖書的查禁，許多中日對譯的讀本，散佚嚴重。近年國家圖書館，透過各種管道，又重新蒐集了戰後臺灣的一些中日文舊籍圖書，並將內文掃描電子化，對研究戰後圖書是很珍貴的資料，本文即以國家圖書館典藏的這批舊籍為研究對象，所探討的時間自戰後開始到學習熱潮的進入尾聲，但因熱潮的消退時間很難確切畫分，它是漸進式的並未有特定的時間，只能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一些報章的內容開始出現民衆種種不滿情緒，此時國語運動雖已在官方的推動下持續著，但民衆那股自發學習的熱情不再，可以窺見這股熱潮的即將結束，因此本文將以1946年底作為探討的斷限，希望能從這些國語讀本中看到一個時代的遞嬗。

二、學習國語的熱潮

在談戰後初學習國語熱潮前，要先來看一下當時臺灣使用語言的狀況。日治時期在總督府「國（日）語普及運動」推展下，日語已相當普及。總督府將日語普及視為同化的根本，抱持著語言同化主義的態度，制定國（日）語普及政策，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甚至社會動員等途徑，積極展開日語教育。當時除了在校學生必須一律說日語外，教員在辦公室內，娛樂場所，也必須以日語交談，

^[5] 何力友，〈戰後初期臺灣國民學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館編《臺灣光復初期出版品書目（1945-1949）》為例〉，《國家圖書館館訊》，4（2006.11），頁16-21。何力友，〈教科書供應模式對戰後初期臺灣文教事業之影響（1945-1949）〉，《臺灣學研究》，6（2008.12），頁89-108。

^[6] 姚榮松，〈蘭記版漢文讀本與漢文化傳承〉，《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2007），頁167-177。

如果說臺灣話，是要受處罰的。從1933年起，開始「國語普及十箇年計劃」，以全臺每一部落設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十年內臺灣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能說日語。^[7]針對不在學校的青年，在各市街分設國語講習所，國語講習所的費用，由政府補助；講習所以12歲以上25歲以下尚不會說日語的青年為對象，施以日語的初等教育為目標；並在各村落裡開辦簡易國語講習所，將施教對象再繼續擴及到尚未入學校的兒童及七十歲以下的成人，利用農閒時間，以3個月至6個月為一期，經費由地方住民負擔，並由州及市街補助。在1932年時，臺灣人能說日語的有22.7%；1940年，已達總人口51%；到日本投降時，臺灣人通日語的則已高達70%以上。^[8]當時任職臺大中文系副教授的吳守禮，他將臺灣人的語言狀況，分三個年齡層來看：

臺灣人的語言層可以分做三階段。就是老年、中年、少年。老年級，除了五十年來沒有機會學日本語的一部分不用提以外，智識人的話語雖然大都是臺灣話，生活語也是臺灣話。但是語彙裡已經滲入不少的日本語和語法了。中年級，除了一部分人沒有熟習日本話，大都能操日本話，看日本書、寫日文，有的更因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走思路作思想都用日本語的語法。這一層的人，有的雖然會說一口還很流利的母語，可恰因為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到家庭的一角落，他們不得不用日語想東西。臺灣話的根幹雖沒有搖動，枝葉的作用已經變了。少年級這一層，不但學會了日本語言，有的簡直不會說臺灣話，實際上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9]

因此當時的普遍現象是，30歲以上的知識份子懂漢文並會寫的百人之中還可以找出一二個。30歲以下就很難找到了。甚至了20歲以下的，往往連臺語都說不完全，還不如說日本話來得流利。^[10]文學家葉石濤及成大教授謝爾昌都說自己在戰前都說日語，連臺語也不會說；由這些描述的狀況來看，戰前日語已是民衆普遍使用的語言，除了說日語、以日文書寫、連思考都是日本語法；尤其是知識份

^[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1992），頁356。

^[8] 薛綏之，〈旅臺雜記〉，《北方雜誌》，6（1947.6），頁32。薛綏之在〈旅臺雜記〉中說日語推行成效：到1937年4月底時，國語講習所已有2,197所，學生131,739人，簡易國語講習所1,735所，學生73,415人。臺灣人能說日語者，在1932年時，有1,022,371人，占總人口22.7%；到1936年時，已有1,641,063人，占總人口32.9%；到1940年，已達總人口51%；1942年則達58%；到日本投降時，臺灣人通日語的則已高達70%以上。

^[9] 吳守禮，〈臺灣人語言意識側面觀〉，《臺灣新生報》，1945.5.21，國語專刊第1期。

^[10] 〈燕京臺灣國語普及會創辦意見書〉，《新臺灣》，1946.2.15，創刊號頁16。

子訊息的傳達與知識的吸收都是依賴日文及日語；日語如此普及，戰後一旦面臨語言文字的改變，學國語的人口眾多，自然形成一股潮流。

當日本戰敗消息傳來，臺灣人首先面臨到「國語」的改變，國語一夕之間由日語變為北京話，對生活衝擊很大，但在對祖國充滿憧憬下，寧可忍受這些不便，想盡辦法要學北京話—即當時的國語。《民報》即說戰後初的興奮、高興情緒，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大家且能自動自發的不再使用日文，禁講日語，甘願忍受這些寫作與談話的不便；並廢寢忘食的認真學習國文，因此進步的特別快速。^[11]

(一)、全民學國語

《新生報》形容，是六百萬臺胞的民族感情，奔騰澎湃。無數人正熱中於學習國語、攻讀國文。^[12]在政府派接收人員尙未來臺的這一段時間，城市裡已瀰漫著學習國語的熱潮，當時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說，初到臺灣時，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熱情地詰屈聱牙學說國語。^[13]《公論報》則說到戰後初臺灣學說國語的盛況：

臺灣光復之初，六百萬同胞爭學國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擠兌」還熱烈。關於國語的書，只要出來就有人買，並且絕對能暢銷；教國語的人，只要你敢教就有人跟你學，並且絕對受歡迎。^[14]

1946年春，王思翔來臺時，所見這種景象仍是如此：臺灣各地普遍自發掀起一場學習中文和國語的群眾運動，如飢似渴地閱讀可能到手的中文書報，舉行各種形式以介紹祖國文化和國內情況為內容的集會。^[15]新聞記者姚隼在〈臺灣文化的飢渴〉一文中說當時不管公教人員、學生、或是管門人不分階級，都在認真地學習國語：「臺省的國語運動已相當普遍，公教人員和學生不用說了，就是商店裡的店員，工廠的工人，以及僕役下女們，都在學習，連我住的那個公家宿舍的

[11] 〈社論·勸勉學徒諸君〉，《民報》，1946.10.1，1版。

[12] 〈社論建設臺灣新文化〉，《臺灣新生報》，1945.11.6，3版。

[13] 葉明勳（1913-2009），〈不容青史盡成灰—二二八親歷的感受〉，《衝越驚濤的時代》（臺北：新生報，1990），頁206。葉明勳，字夏風，福建浦城縣人，1945年10月以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身份，由重慶偕同國民政府首批前進指揮所人員到臺灣。

[14]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2.14，3版。

[15]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頁28。王思翔，浙江平陽人，1921年生，於1945年秋與表兄弟周夢江兩人來臺避禍，在臺中擔任《和平日報》編輯工作時，與中部文化人士有所往來，與中部人士共同創刊《新知識》與《文化交流》。二二八事件後再度逃亡離臺灣回大陸，寫〈臺灣2月革命記〉。

一個管門人，每天晚上都在熱心不懈地唸著國語呢。」^[16]由這些描述來看，學國語這股熱潮在當時幾乎全是自發性的學習，而且成了老老少少不分年齡，不分階級的全民運動。

待何容初來臺時，^[17]也感受到這一股狂熱，據他分析一般人熱烈學習國語的動機，有的是由於純粹的「祖國熱」（純潔得可敬可愛），有的是由於「要為祖國服務」（理智得可欽可佩），當然也有的是由於「想做新官僚」（投機得可驚可懼）。連尚未遣送的日本人，都偷偷的在家中讀《華語急就篇》。^[18]臺灣文學作家吳新榮在〈文化在農村〉一文中即道出那種「祖國熱」的心情：

光復當初我們時常走到學校裡，看看學童上課的情形，那時候最使我們感激而興奮的不外是：用我們的語言，寫我們的文字，教我們的子弟，這個事實。因為在這神聖的教壇上，好久未曾見過公然地自由地使用我們的臺灣話，因為祖國光榮的勝利，臺灣話竟驅逐了日本話。^[19]

十足反映了當時的心情，不單只是學語言而已，還意味著民族精神的恢復。

學習國語的空氣這樣濃厚，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教學方式，有的找人教授，有的上補習班，有的即使在路邊聽廣播、在市場跟著學幾句，各種場合都成了學國語的場所。李爾康1945年10月來臺時所看到臺北的街頭，到處都陸續出現了「北京話補習班」的招牌。^[20]在日治時期被強迫停辦的書房，又恢復起來，原來的私塾老師，以「天地玄黃」一類舊教材開始傳習漢文；如臺中市的何厝書房，原於1943年停辦，1945年10月11日改為「光復學院」，開始招生上課。抗戰期間被日人從淪陷區請來訓練特務和通譯的「教官話」人，也趁機傳習起「北京語」；也有人在市場的屋簷牆角掛上一面小黑板就傳習幾句會話，以便向圍攏來的臨時學員收臨時學費，當時真可說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了。^[21]

（二）、國語補習班紛紛成立

^[16] 姚隼，〈臺灣文化的飢渴〉，《臺灣新生報》，1946.11.4，4版。

^[17] 何容(1903-1990)，原名何兆熊，字子祥，號談易，筆名老談，以何容之筆名行世，河北深澤縣人，因受聘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專任委員來臺。

^[18]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10。

^[19] 此時上課仍用臺灣話，並非北京話。吳新榮，〈文化在農村〉，《臺灣文化》，1：1（1946.9），頁21。吳新榮，字史民，號震瀛，臺南市人，東京醫科大學畢業，參與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新文學》、《臺灣文學》、《民俗臺灣》等。

^[20] 李爾康，〈三十四年來臺夢迴錄〉，《傳記文學》，35：4（1979.4），頁101。

^[21]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10。

各地陸陸續續開起國語補習班，鍾肇政說那時在ㄅㄆㄇ都還沒有傳進來的時候，他們鄉下就有四所北京語（那時還不叫國語）補習班，第一家是來接收警察單位的派出所主管開的，他是從廣東梅縣來的，講的話其實是客家話，他開班授徒教北京話，但聽一聽會發現他講的其實跟客家話一樣。第二位是廣東中山大學畢業，戰後才回來的所謂半山，他的底細當時沒有人知道。但他開班授徒，照樣門庭若市。第三個也是龍潭本地人，日治時期曾參加過臺北的北京語補習班，因為曾在北京語班受過訓練，戰後搖身一變也開始開班授徒了。另一個即是鍾肇政父親開的，他父親只跑過一次中國大陸，在那待了一個月，學了幾句那邊的話，光復後也在龍潭三和鄉下，開北京語班授徒。^[22]

除了在鄉下掛牌開班授徒的，在都市更是不乏開班者，葉龍彥曾訪問過在迪化街醫師寓所開國語講習所的陳禮圖中醫師，陳禮圖表示，戰前曾跟臺灣文化協會的李友三學習過北京話，戰後便自行開班授徒教國語。據陳醫師說，當時他的國語講習所，生意非常好，天天上課，每天有六、七十個人，連小學校長、臺大醫師都來學，分男女兩班，每次授課90分鐘，一期3個月，收費15至20元。^[23]

各地掀起了學習國語的熱潮，原本學習日語的研究會，也紛紛改成國語的研究會，據《民報》形容「自光復後，各地研究國語者頗形踴躍，各種研究國語機關，如雨後春筍」，例如華光國語同盟是由稻江青年組成，以研究並普及國語，提高民族精神為宗旨，創設華光國語同盟，會員多在各機關服務，人數約六十餘；^[24]臺南市的南友國語研究會，熱衷於國語研讀、推廣，編了《精選實用國語會話》；臺中的國文普及研究會自編《速成國文讀本》；連遠在外地的臺灣省旅平同鄉會顧問梁永祿也成立「臺灣國語普及運動會」，期望臺灣能在最短期間內普及國語。^[25]

以上這些國語補習班、研究會多屬民間的，另外還有一些機關、駐軍及事業單位也紛紛開始開設國語補習班，這些機關與駐軍的國語補習班，多是義務性質，提供免費講習，這些公家機構多係奉上級命令辦理，其廣告宣傳費亦為公家支援；像臺北憲兵四團所屬單位，臺北北區憲兵隊、陸軍第七十軍政治部各直屬營指導員室、臺北南區憲兵隊、彰化一五七師七一團政訓室、基隆國軍七十軍七十五師二二三團政治指導室等，由於免收學費（有些酌收講義教材費），參加補習的學員非常踴躍，少者200名，多者2,000名。這類補習班均利用國民學校、

^[22]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臺北：前衛，2000），頁46-47。

^[23]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8-39。

^[24] 〈華光國語同盟〉，《民報》，1945.10.28，1版。

^[25] 金文昶，〈漫談國語與臺灣推行國語〉，《新臺灣》，2（1946.2.28），頁4。

女學校或神學校的教室設備，分班上課，有些甚至因師資不足，集中在禮堂上課。不過，此類義務性補習，在課程中都會加授「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黨義」、「音樂」等。^[26]

後來各地國民學校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國語補習班，民衆也是踴躍報名，像臺北太平國民學校甚至半日就超過4,000人，^[27]可見當時的盛況。這一段時期各機關團體，幾乎都設有國語班，至於全省共有多少這種性質的班，向來沒有詳細統計，因為剛開始辦國語班既不需立案、備案，有教師有學員就可以開班，並且多在課餘時間；事業機構都由福利單位辦理。^[28]

原本戰爭初期為支應戰爭培養「支那語人材」，在臺北私立商工學校設立的「支那大陸進出者北京語講習會」，取下原有的招牌，轉身一變成爲「臺北光華國語普及學校」，成爲當時有名的國語講習班；大家都爭相入學，學員有臺北州知事、原日本官吏、老人、青年少年，其盛況堪稱臺北之最。^[29]這種規模大的專門補習班，還有發售簡章及報名表；除分日間部及夜間部授課外，並依程度分初級、高級及專科班三種班別。^[30]高級班要求曾受過3個月以上國語教育訓練者；專科班亦爲師範班是要求發音正確，且經面試合格者；初級班也要求至少要國民學校以上畢業者；首次招生，就招收了高級班400名，專科班100名，初級班500名，總共1,000名，規模甚大。其中師範班是爲培養師資而設，出路很好，最受歡迎。^[31]

而以前民間開辦補習班、講習所後來也需要證照，像陳禮圖開辦的講習所一年後，臺北市教育局派接收員來查訪他的國語講習所，勸他去臺北市教育局考試取得證件。爲此他還特地跑去參加考試，當時考試的過程是前10分鐘先口試，問題如：「怎樣學好國語？」「醫師爲什麼要教國語？」，然後拿教育局的教材念給官員聽，注意國語的四聲與字母的發音是否標準。通過檢定後，即可獲頒國語講習所證件。^[32]因此可以想見在需檢定與發證照之前，國語補習班林立，但也良莠不齊。

^[26]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6、40-41。

^[27] 〈本省人熱心學國語半日間報名4千人〉《民報》，1945.11.21，1版。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6。

^[28] 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1974），頁64。

^[29]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臺北：聯經，2005），頁183。

^[30] 「廣告」，《民報》，394（1946.8.27），2版。

^[31]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9-40。

^[32]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8-39。以上資料係葉龍彥於1988年12月12日下午1點半到4點20分，在迪化街陳禮圖中醫診所訪問之紀錄。

(三)、聽廣播學國語

上補習班學國語除了要有時間外，還要交學費，聽廣播學國語成了大部分民衆學國語的另一重要管道，日治時期廣播事業發達，1943年時全島廣播收聽戶就超過十萬戶，雖然收聽戶中臺、日人比例不均（臺、日人普及率分別為6.3%與49.8%）。但整體而言平均每十戶或每六十個人即有一臺收音機；對於這種現象，1945年由大陸來臺接收廣播電臺的工務課長林柏中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收音機價格低廉、收聽費不高，容易購買收聽；第二、放送協會設有「勸誘員」，以佣金制度促其致力宣傳裝設收音機，收效頗佳；第三、臺灣民衆平均教育水準日漸高昇，培養出收聽廣播的習慣。^[33]

當時來臺接收臺灣廣播電臺的林忠，^[34]原是南投人，1939年時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他已經注意到利用電臺推廣國語教育的功效，他認為戰後語言問題將阻礙臺人與負責接收官員之溝通；在獲悉抗戰勝利後，爲了在臺灣推行國語，林忠在重慶利用空餘時間，編寫了《國語廣播教本》。^[35]戰後林忠負責臺灣區廣播電臺的接收，接著他又擔任臺灣廣播電臺臺長，即以自己所編的《國語廣播教本》爲教本，開始在電臺以廣播的方式教大家說國語。負責廣播教學的是由

^[33]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7），頁92。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7），頁92。轉引自林柏中，〈臺灣廣播事業的過去與現在〉，《臺灣之聲》，創刊號（臺北：臺灣之聲，1946.6），頁6。

^[34]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26-27。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49-52。林忠，西元1914年生，原名林坤義，別號海濤，籍貫南投草屯。就讀南投碧峰公學校及草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經高等科校長推薦，前往日本廣島廣陵中學就讀，後轉學廣島修道中學。中學三年級時因父親病重而返回臺灣，父親過世後，兄長原希望他協助家中生意，但他仍堅持回廣島唸書，中學四年級時以第一名成績考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申請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就讀。在京都帝大讀了一學期，暑假期間至北平旅行，偶然聽到收音機報導蘆溝橋事件爆發，沿途因日本留學生身分而遭盤查監視，歷經波折才返回京都。

隨著中日戰爭持續擴大，林忠於1937年9月放棄日本學業，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行列。初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少校組員，除擔任對日宣傳工作外，每晚至南京中央廣播電臺以日語對日廣播。南京撤退後轉赴漢口；後因長沙電臺電力較大，不久被派往長沙，除每晚對日廣播外，每週日增加以臺語對臺廣播。1939年6月國際廣播電臺成立，林忠調回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除每晚對日廣播新聞及評論外，同時，邀請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與青山和夫對日演講及製廣播短劇等節目，並利用日本俘虜從事心戰工作。

^[35]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52。

林忠的太太錢韻女士負責，從1945年12月1日開始，透過電臺施行空中教學教授國語，一天有兩時段播放，早上是從7點25分到7點55分，晚上則是從6點到6點半；^[36]是當時所有國語教育節目中收效最顯著者。^[37]

據林忠口述，當時臺灣人對學國語非常熱衷，知名人士如顏欽賢、林獻堂等也都在學。林獻堂有客人來，如遇國語廣播時間，林都要對方稍等，先聽過廣播、學好國語後再接待客人。他也曾看見人力車伏在等候客人時，在街旁拿出教本，借聽商店放出的國語教授節目，學習國語。這種學習熱潮，到處可見。^[38]從這些描述似乎可見一時之間人手一冊讀本守在收音機前的那種盛況。

官方正式開始推行國語政策是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以後，1945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洽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派員來臺協助，但因正值戰後復員之際，人材羅致不易，幾經商洽後決定八人來臺，其中除了魏建功、何容、王炬三人是由教育部調派外，其餘則是臨時辭了原來的職務應邀參加的。這八人分三批起程，帶著推行國語的相關法令、書籍和器材，於1945年11月抵臺；抵臺後次年2月開始籌備，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39]開始在臺灣推行國語。

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後，最初也是從廣播教學節目開始，第一個節目是「國語發音示範」，先將全省僅有的一套國語留聲片，拿到廣播電臺播放；這套留聲片是由教育部灌製，趙元任博士發音，留聲片廣播與聽眾多少有距離感。後來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齊鐵恨^[40]自上海來臺，從5月1日起，改由他擔任真人讀音的「國語讀音示範」，有真人開始講國語的音，不再只是發國語的音，每日30分鐘，時間是每日下午1時到1時30分，到9月1日開始，時間又更改為每日上午7點40分至8點40分。^[41]播讀的是臺灣省教育處出版的《民衆國語讀本》，節目中由林紹賢（原書編者、時任教育處）用閩南語翻譯，以供全省民衆收聽。在四冊讀本講

^[36] 〈臺灣廣播電臺開始講讀國語〉，《民報》，50（1945.11.28），2版。

^[37] 林平，〈戰後初年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1945-1947）—以臺灣廣播電臺為中心〉，《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132。

^[38]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0。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52。

^[39]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9-10。

^[40] 齊鐵恨（1892-1977），北平香山人，歷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4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代電1946.8.30：電知更改國語發音示範廣播時間〉，張博宇，〈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臺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新竹：新竹社教館，1987），頁446。

完之後，繼續播講《國民學校暫用國語讀本》，由廈門來臺的林良^[42]擔任閩南語翻譯，除供一般民衆收聽之外，主要目的爲了讓全省小學教師每早上上課前，先集中辦公室收聽一遍標準國語，再去上課。^[43]因此每校都補助經費購置收音機。^[44]

當時節目不能預製，所以都是現場播送，主講人有事時，節目就面臨停播，如1946年6月齊鐵恨因應邀參加全省教育行政會議，國語示範發音即得暫停三天。^[45]因爲現場直播，播講人也一定要準時抵達電臺，林良說當時播講人必須在七點一刻以前抵達現場，但他是夜貓子，每天晚上看書看到深夜一兩點，早上六點多鐘起床，實在十分吃力。有時候從夢中驚醒已經七點鐘了，連臉都來不及洗就得直奔過去，更不要說吃甚麼早餐。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舊腳踏車，因爲起身遲，總是騎得飛快。有一次，飛車撞到一個賣豆腐的，弄破了幾塊豆腐，沒有時間道歉，也談不上甚麼「理賠」，掏出幾張鈔票，扔在豆腐擔上，賣豆腐的還不來及破口大罵，他已身在百步之外了；進入播音室，節目才剛開播，喘息未定，立刻就用閩南語講解齊鐵恨教授剛說完的話。^[46]

除了上補習班、聽廣播學國語外，還有不少人是自修的方式學國語，市面也出現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學習讀本，配合各種學習國語的方法，展現國語熱潮的另一個巔峰。

三、國語讀本的出版

日治時期民衆慣讀日文書籍，市面上中文書籍本來就很少，戰後語言文字一夕之間由日文改爲中文，原本漢文舊籍開始紛紛拿出來販售，如過去私塾所使用的教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也有不少是《四書》、《唐詩三百首》、《千家詩》之類的讀物，但此類圖書早已不符合當時的需要，而且紙質印刷也都不理想；反而過去日治時期學習北京語或官話的讀本，此時應需要

^[42] 林良，筆名子敏，福建同安人，1924年出生於日本，1946年因考上教育部招考的國語推行員前來臺灣。

^[43] 林良，〈中廣和我〉，《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121。齊鐵恨，〈國語的廣播教學〉，《教育與文化》，13：6（1956.9.13），頁2。

^[44] 〈各地國民學校均設收音機〉《民報》，1946.10.19，3版。

^[45] 〈國語讀音示範現仍照常廣播〉，《民報》，1946.6.30，2版。

^[46] 林良，〈中廣和我〉，《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121。

重新被拿出來當國語教材使用，如明治14年（1881）出版，昭和13年（1938）改訂版的《官話指南》；昭和13年臺灣新民報社所發行的《北京語の基礎》等都出現在市面上。^[47]

可以從1945年11月這段時間接連幾天《新生報》上三益商事社的售書廣告來看，有《獨習華語入門》、《北京官話入門》、《最新國語教本前後編》，這些出版品各式的稱法，或稱華語、或稱北京語、官話、也有稱國語的；一般而言，「華語」是以外國人角度來說；「官話」則是早期的稱法，1909年以前標準語並沒有國語這種稱法，而是以明清時代官方使用語言當標準語，所以稱「官話」；而「國語」一詞在臺灣又因政權更迭而有所不同，在日治時期的「國語」，是日語；戰後指的是民國初教育部以北京語為藍本，訂出的標準語。

因為大部分民衆仍慣用日語，市面上這些讀本幾乎都以日文編訂成書，在內容上，往往也因為編者、學習者的不同，各展現有其不同的特色，本文將目前可查到1945至1946年出版學習國語的出版品列表如後，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分為三類：會話、讀本、工具書。大抵而言，以日文釋義的國語讀本仍佔多數，少數尚有以國語、方言對照的讀本；且因是以學習國語為目標，多以會話為主，其次才是培養閱讀中文的能力。這時期的國語讀本的特色為：許多讀本翻印自戰前、而這些讀本又有各種標音、過去的漢文讀本又重新出版、也有不少是針對以方言學國語的讀本出現，以下則依這些特色分別探討之。

（一）、以日文編訂的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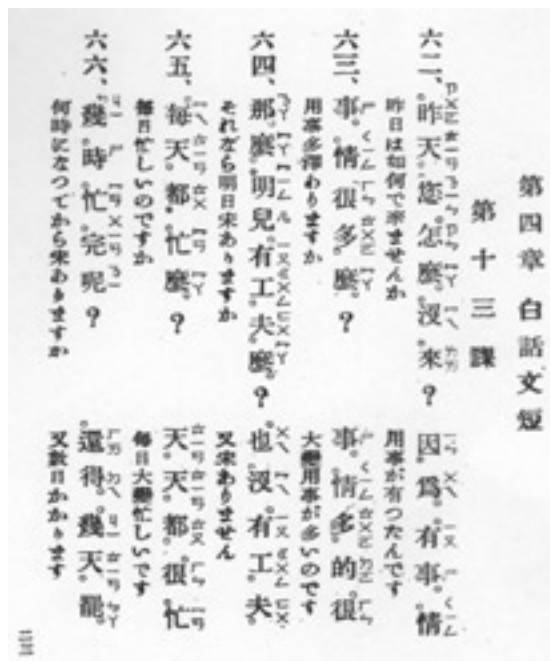
為了適應一般的需要，這時期的出版品不論會話、讀本（漢文讀本除外）、工具書都必須以日文解說，因此過去一些日本人學華語的教科書，戰後重新更改書名為「國語」，再重新出版，如宮越健三、杉武夫合編的《國語基礎會話》與神谷衡平、清水元助合編的《標準中華國語教科書初級篇》，編者都是東京外國語學教授，這兩部也都是戰前日本人學中國語的教科書；^[48]又如薛瑞麒的《最新國語教本》，由臺南崇文書局出版，^[49]該書翻印自《北京官話大全》。而1945年出版的《國語註譯學習讀本》為例，編者及出版項均不詳，但詳細的日文解說來

^[47] 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1974），頁130。

^[48]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2005.10），頁90-91。

^[49] 「廣告」，《臺灣新生報》，1945.11.29，1版。薛瑞麒（古山友一改名）之《最新國語教本》，由三益商事社再版。全書分三部分，一、發音篇，二、基本文法，三、會話及白話文；以日文介紹注音符號的發音、國語的基本文法，會話與白話文部分也附有日文註解；書後附〈四字成語萃選〉、〈北平俗諺〉的中日文對照。

推測，應也是戰前出版品，更改書名後重新出版的，該書內容共分五章，〈注音符號〉、〈聲音の區別〉、〈簡易會話〉、〈白話短文〉、〈附錄〉，前二章以日文介紹注音符號的發音、四聲的變化，第三、四章是會話與白話短文，會話與短文同時標出國語注音與日文譯文，第五章附錄則是各類名詞的中日對照。



圖一：《國語註譯學習讀本》，會話型式讀本，有國語注音及日文對照。

東寧書局出版的《華語新聞の讀み方》，是以中文閱讀為主，分《基礎篇》與《解釋篇》兩卷，以《解釋篇》為例，包括公文、記事、廣告，每則包括主文、語釋（語詞解釋）、通釋（全文翻譯）三部分。以《解釋篇》的一則〈吉房出售〉來看，是教導讀者如何看懂一張售屋廣告，文中先列出一則房屋出售廣告，先解釋其中「吉屋出售」、「住房」、「坐落」、…等語詞，再將整則廣告全部譯成日文，此書應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手冊。

吉房出售

茲有住房一所。
坐落地安門小石橋

東口。約房七十餘間。畫閣・廳梁・花園・假山。以及電燈・電話・自來水。一切設備俱全。茲願以廉價出讓。購者請至齊化門北小街十二號接洽可也。

が、場所は地安門小石橋東口で、大約の延べ間口は七十餘間、畫閣・廳梁・花園・樂山をはじめ電燈・電話・水道等に至るまで一切の設備が完全です。今較廉價にて御譲り致します。御希望の方はどうぞ齊化門北小街十二號まで御照會を願ひます。

〔語釋〕 ◇吉房出售（よき賣家、貸家賣家の廣告には必ず吉房といふ） ◇住房（住宅） ◇坐落（場所） ◇七十餘間（延べ間口七十餘間） ◇畫閣廳梁美しい高樓と彫刻せる梁） ◇假山（樂山） ◇自來水（水道）

〔通釋〕 よき賣家、住宅が一軒より多すが、場所は地安門小石橋東口で、大約の延べ間口は七十餘間、畫閣・廳梁・花園・樂山をはじめ電燈・電話・水道等に至るまで一切の設備が完全です。今較廉價にて御譲り致します。御希望の方はどうぞ齊化門北小街十二號まで御照會を願ひます。

- 43 -

圖二：《華語新聞の讀み方》，以日文解釋房屋出售廣告中的內容。

另一部中文閱讀的自修課本是三省印書館出版的《華語自修書》，該書由臺北經濟專門學校^[50]的教授香坂順一所編，除了課文是中文外，其他部分都是以日文編訂、日文解說，一共四卷，由卷一到卷四，每卷課文大約20課到30課，課文內容則由簡而難，到第四卷時已經開始有文言文的出現，所選課文不少為當時名家的文章，例如胡適〈新生活〉、謝冰心〈山中雜記〉、老向〈寄包裹〉、茅盾

^[50] 臺北經濟學校原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後改為臺北經濟專門學校，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後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1947年1月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後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

〈天窗〉、豐子愷〈比較〉、老舍〈駱駝祥子〉、郁達夫〈說肥瘦長短之類〉、魯迅〈孔乙己〉等。每一課內容型式，與現今教科書類似，包括：課文、生字表、註釋、文法、全文翻譯、問題練習等。



圖三：《華語自修書》，每一課內容包括課文、生字表、註釋、文法、全文翻譯、問題練習等，全書皆以日文解釋。

以當時說日語非常普遍的情形來看，以日文學習國語是相當普遍的方式，不論中學生和大學生在作文時，先用日文起稿，再去掉平假名、片假名，換些中文字，略改句法，循著日語的思路寫出中文作文。^[51]鍾理和說日文間接有助於國語文的學習，^[52]對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以日文著手學習國語是較能符合現實的需要。

(二)、各式標音

這時期的出版品對於國語發音的標音有三種：日本假名拼音、羅馬拼音及注音符號；但此階段注音符號標調方式尚未統一，因此注音四聲的標調方式各異，如以老式四角標調法，是以「。」或「·」符號的位置表示四聲，在字的左下角表一聲，左上角表二聲，右上角表三聲，右下角表四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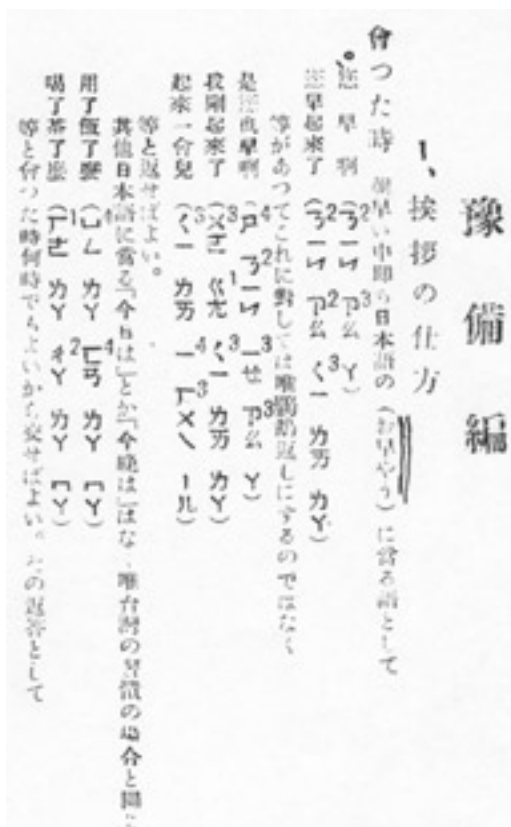
^[51]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52] 江流（鍾理和），〈在全民教育聲中的新臺灣教育問題〉，《新臺灣》，4（1946.5.1），頁5。



圖四：以「。」或「•」符號的位置表示四聲。

另一種四聲標調符號是以「1、2、3、4」標示在注音符號的右上角，代替四聲的「陰平、陽平、上、去」；如臺中大同會編的《國語會話集》注音符號是以「1、2、3、4」標出四聲；國語普及會編的《國語會話教本》，也是以「1、2、3、4」標出四聲。



圖五：臺中大同會編的《國語會話集》是以「1、2、3、4」標出四聲。

而注音符號「一 (yi)」的寫法，與現今寫法又有所不同，這時期的讀本，注音符號常常不論直式橫書，都將「一」寫成「1」，如臺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

的《國語》，中文字橫排，注音符號「一」，寫成「1」；華美出版社的《國語會話》讀本內容文字是直式，注音符號也寫成「1」。



圖六：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國語》，文字為橫式排列，注音符號「一」為直式「1」。



圖七：華美出版社1945年的《國語會話》注音符號「一」為直寫「1」。

能正確使用新式注音符號印刷出版的，以林忠的《國語廣播教本》為代表。林忠這套《國語廣播教本》，在抗戰勝利之初，於重慶編寫的，然後帶到臺灣出版，由於當時臺灣沒有注音符號的活字印刷，於是託有印刷所的同志周井田，專程去鑄刻注音符號鉛字後，再將書印出。據林忠說這套教本，當時印了幾十萬本，銷路不錯，也有人盜印。而當時國民學校一時沒有國語讀本，也有用此套書當臨時教科書。^[53]這套《國語廣播教本》，由淺而深，一共有四冊，第一冊注重發音，所以第一課的〈國音字母〉除列出國語注音符號外，並加注國音、閩南音、日本語音與羅馬拼音；第二冊注重實用會話；第三冊為簡易讀本；內容包括文法、常用會話、國家大事等為主；第四冊內容偏重國家意識，強調民族精神。^[54]

^[53]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0。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52。

^[54] 林忠，〈自序〉，《國語廣播教本》（臺北：臺灣實業，1945）。



圖八：林忠編的《國語廣播教本》中日文對照，是少數以新式注音符號印刷的讀本。

除了以注音符號標音外，也有以羅馬字母拼音的。不少國語讀本或學習國語的工具書以國臺、日華對照，標音除了注音符號外、多會加上羅馬拼音、或日語發音；這些都爲了便於以日語、臺語來學習國語。

東方出版社1946年出版《日華辭典》，針對臺灣人從日文查出中文，以五十音爲檢索方式，每字詞同時列出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



圖九：左—《日華辭典》以「。」標四聲；右—《國臺音萬字典》以「·」標四聲，後有羅馬音標臺音，每字有釋義。

蘭記針對臺灣語言過渡期，編輯了幾種工具書，1946年出版，由二樹庵、詹鎮卿合編的《國臺音萬字典》，字首後用以老式四角標調法注音符號注國音，後用羅馬拼音標出臺音，每字有釋義，便於以臺語學習國語。另外尚有以白話註解的《國臺音小辭典》、《日文對譯國語大辭典》等。

蘭記又於1946年7月10日，出版了以國音標註《中華大字典》，由黃森峰編輯，一共四冊，^[55]參考《辭源》，從中取約常用的一萬多字，字典以青年學生，教會人士為對象，該書一出版即銷售一空，8月時又再印1萬部，此時售價也隨之上漲一倍。該書依部首排序，每頁三欄，每字字頭下先標注音字母，接著標反切、直音、聲調、韻目、釋義等。排版小字頗為美觀。釋義下引用書證甚詳，兼收科學名詞，綱舉目張，夠得上稱《中華大字典》，被姚榮松稱是蘭記出版語文工具書中水準最高的。^[56]

多元標音並陳的時期並沒有維持多久，在官方推動下最後以注音符號取代其他拼音方式，注音符號排擠掉日文拼音，也排擠掉羅馬拼音，這些原本應該要經過緩慢醞釀，彼此約定成俗規律下的發展，在政治力的壓縮下力求推行標準，罷黜了日後各類拼音蓬勃發展的生機。

(三)、漢文讀本重新出版

另一類的國語讀本，則是過去臺灣的漢文讀本，又再重新改編出版問世，原本日治時期臺灣的北京語讀本、漢文讀本即有一定的銷售量，由寄給嘉義蘭記書局的郵件，可以發現各地書店的訂購，如臺北日光堂給蘭記訂購函「貴店所發行之北京話讀本、或其他北京話書籍若有庫存，煩請透過日配給予一千部的配給。若需敝店之發行物也請不吝告知。八月十九日」。屏東張天□則有「漢文讀本當天就賣完了。每天都有客人來催促詢問何時還會進書，希望能早日印刷完成。若書上梓，煩請以最快速度寄來五百部左右，因為銷售狀況實在太熱烈」的來信；羅東日榮堂書店訂購《字母讀音北京語讀本》一百冊等等。^[57]

因此戰後最具代表性的漢文讀本，應是嘉義蘭記書局自己編的這套《漢文讀本》，這套讀本最早是由書局創辦人黃茂盛所編。黃茂盛在日治時期曾進口商務

^[55] 「蘭記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7.27，3版。

^[56] 姚榮松，〈從蘭記的語文圖書看光復初期雙語並存的榮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191。

^[57] 河原功、張文薰譯，〈臺灣出版會與蘭記書局〉《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2007），頁70。

印書館的《最新國文讀本》一至八冊，但因內容全是有關中國之歷史、文化、教育、思想等，違反日本國策，悉遭當局沒收；於是黃茂盛自己依據商務版，著手編撰更適合臺灣幼年學習的《初學必需漢文讀本》一至八冊；因為此套讀本足堪取代過去民間習用的三字經、昔字賢文等教材，因此1928年一出版，^[58]馬上被搶購一空，隔年又在上海中西書局及嘉義源祥印書館同時大量印刷。^[59]

1937年皇民化運動後，許多私塾書房被迫關門，漢文書檢查更趨嚴格，蘭記早先一步於1936年委由蔡哲人對讀本內容進行修訂，而將部分課文改為日本帝國及日本內地文獻，如第三冊第一課原為〈讀書〉，修訂後改為〈天長節〉（日皇誕生紀念日）；第四冊第一課原為〈書語〉，改為〈臺灣總督府〉；第五冊第2課原為〈模範學生〉，改為〈能久親王〉，並於第一冊增加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以符合殖民教育政策的規定，減少被禁制的可能。^[60]

戰後《漢文讀本》在國語讀本奇缺下，成了炙手可熱的出版品，供不應求，需書量大增，也是因為學校國語教材嚴重荒欠；當時不只是臺灣缺教材，是全國嚴重缺乏，淪陷區的上海尚未復員，待1946年幾家出版教科書的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遷回上海後，印書業務才漸上軌道，但這些教科書尚無法供應內地需要，遑論運送至臺灣，在急迫需要國語教科書情況下，臺灣在1946年開學時，連課本都沒有，許多學校因應急需，臨時決定以蘭記出版的《初級漢文讀本》權充小學國文課本，而《高級漢文讀本》則充當中學國文課本。^[61]

蘭記戰後重新出版的漢文讀本，不但將過去殖民統治時期內容又重新修訂，並重新更名為《初級國語讀本》、《高級國文讀本》，一時之間需書數十萬冊，蘭記書局即使日夜趕工也無法應付，而各地書商遂趁機依據蘭記版課文內容重新製版發售；黃茂盛認為有教材可學習比較重要，故對翻印者未加以追究。^[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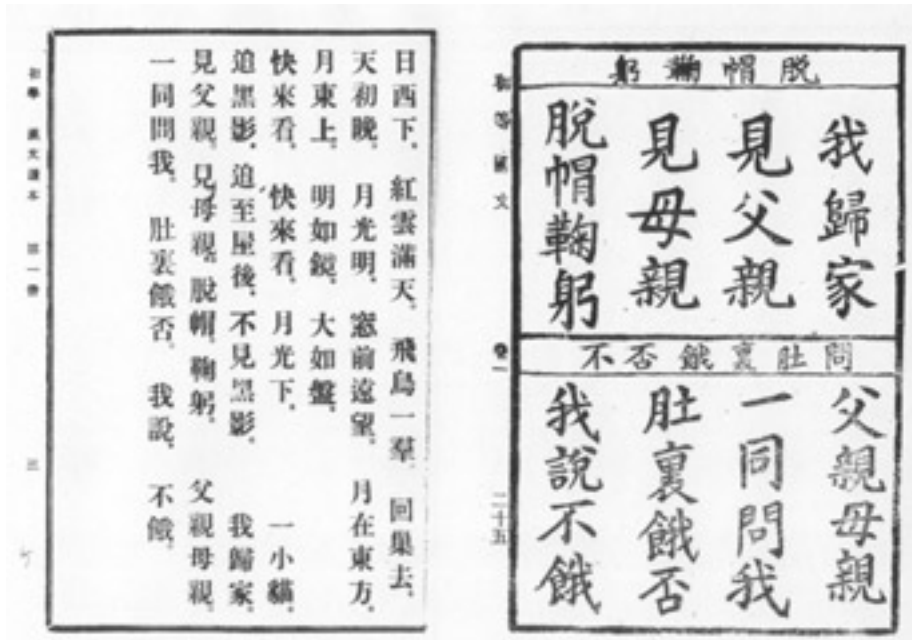
^[58] 2004年改版書名《初級臺語讀本》，其序「初版於民國十七年嘉義蘭記圖書局發行（取材自大陸教本）」

^[59] 黃陳瑞珠，〈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 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6-7。

^[60] 蘇全正，〈蘭記編印之漢文讀本的出版與流通〉，《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159-161。

^[61] 蔡盛琦，〈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87。

^[62] 張貝雯，〈嘉義蘭記書局以漢文讀本跨越兩個時代〉，《明日報》，2001.2.12。



圖十：新生教育會的《初等國文》與臺南新盛文書局的《初學必由國文讀本》課文內容相同，全出自蘭記的《初級國語讀本》。

以現今國家圖書館所典藏幾家書店出版的讀本比對，可以發現幾家內容均與蘭記版完全相同，其中如1945年新生教育會出版的《初等國文》的課文、臺南新盛文書局1945年10月出版的《初學必由國文讀本》；^[63]又如臺中瑞成書局1945年出版的《初等實用漢文讀本》、高雄上海書店1945年出版的《學生必讀國文教科書》與蘭記書局的《初級國語讀本》，課文內容完全相同，但這些排版字體皆不同，應是依據蘭記的讀本重新製版印刷的。

可以想見當初在課本急缺的情形下，蘭記版的漢文讀本成了臺灣普遍的國語讀本。這種漢文讀本的傳承了民國初商務版、開明版教科書的基本型式，每一課搭配一圖，圖文並茂，讀本內容文句押韻，如童詩一般，初學者由「人，人有兩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開始，很快就能朗朗上口。到進階時課文語法已是半文言文，如〈模範學生〉^[64]：「師問諸生曰，汝等知同學中誰可為模範學生乎，於是各以學業優良者對。師曰是固足為模範矣…」。到高

^[63] 編者是屏東的尤鏡明，尤也在自序中說編此書的動機，針對慣用日語完全不識漢字的青年男女而編。

^[64] 蔡哲人編，〈第二課模範學生〉，《初級國文讀本·第5冊》（嘉記：蘭記，1945），頁2。

級國文讀本時，課文選輯的多是當時名家的作品，其中可看到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高爾基、茅盾、郭沫若等的文章。



圖十一：瑞成《初等實用漢文讀本》與蘭記《初級國文讀本》課文內容相同，但已重新排版，生字部分並標明注音符號，這是過去漢文讀本所無的。

當然讀本選材內容，不光是以語言、文學作品為主，幾乎網羅各類素材，可以看出這些讀本的精神，不僅當成教授國語，也要由文字中傳播現代文明知識，如〈電報〉、〈圖書館〉、〈地球〉、〈微生物〉、〈奇異植物〉等；或建構國家意識、認識近代歷史，如〈中國人〉、〈國旗〉、〈孫中山先生〉、〈七十二烈士〉、〈為什麼革命〉、〈三民主義〉、〈我們的國家〉；或強調公民強身的重要，如〈戒煙酒〉、〈養成鐵一樣的身體〉、〈美國梯爾門〉、〈戒吸煙〉等。這類漢文讀本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是，過去在私塾傳授時多以方言教授，文字旁並沒有標出注音符號，戰後出版的漢文讀本，在每課生字上都加上了注音符號，課文的朗讀也由過去的閩南語、客家語變成國語。

(四)、以方言對照國語

不論閩南語或客家語與國語有相通的語法，如果先從恢復方言開始熟悉語法，等方言熟悉後對照國語，一定會比一開始學標準發音效果好，但當時最普遍

學國語的方式，仍是以日文標音出國語標準音，這種學國語的方式，是以外國人學語言的方式，先從發音開始，再進入句子及文法；但是方言與國語有相通的語法，如果先從恢復方言開始熟悉語法，等方言熟悉後對照國語，一定會比一開始學標準發音效果好。因此何容與魏建功都一直主張用以方言來學國語；魏建功主張推行國語的方法是，先樹立國音標準，再從方言學習國語，反對用學外國語的方法學國語；他說：「外國人學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是學一個記一個，我們有『方言』和『標準語』對照的關係存在，學習方法上應該有捷徑可走。」^[65]他認為方言與國語有相通的語法，以方言來學國語比用外國人方式學國語效果要好，他並呼籲，「我對於臺灣人學習國語的問題，認為不是一個單純語文訓練，卻已牽涉到文章和思路的問題。因此很懇摯而坦白的提倡臺灣人要自己發揮出自己方言的應用力量。」^[66]針對主張採用國臺對譯教學法，魏建功親自撰寫國語臺語讀音對照本〈注音符號十八課〉，分別將標準音與廈門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對照舉例，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的《新生報》專欄「國語」連載刊出。^[67]

| 廈門音 | 標準音 | 客家音 | 泉州音 | 漳州音 | 廈門音 | 標準音 | 第一課 |
|-----|-----|-----|-----|-----|-----|-----|-----|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矣 |

圖十二：魏建功撰寫〈注音符號十八課〉，國語臺語讀音對照，分別將標準音與廈門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對照。

^[65] 魏建功，〈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臺灣新生報》，1946.5.28，國語第5期。

^[66] 魏建功，〈何以提倡臺灣話學習國語〉，《臺灣新生報》，1946.5.28，國語第2期。

^[67]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1（2005.10），頁102。

何容也認同先恢復方言，能像其他各省一樣以各省方言溝通，再來學國語的標準發音：

我們寧願本省同胞像內地各省同胞一樣，能用不很標準的國語自由自在的達意表情，不願他們懂學得幾句頂漂亮的北平話，而不能自由運用「漢語」，以致非用「日語」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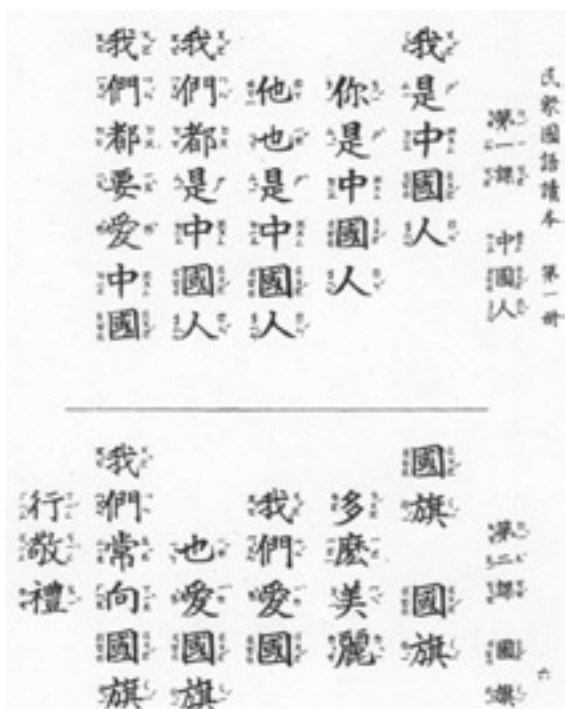
我們並沒有忽略本省同胞急需學習「日常會話」，但是我們認為本省國語教育的目標是「恢復祖國語文」。我們要幫助本省同胞重拾起『從方言學國語』這把金鑰匙，走上恢復祖國語文的大路。假如本省的國語教育就只是教人會說『您貴姓？這本兒書賣多兒錢？』一類的話，那我就要說句狂妄的話，其事甚易，用不著我們這些書呆子來浪費臺灣的米。^[68]

他也認為在國語當無法普及下，如果以方言代替，減少說日語的機會，不一定堅持要先以標準的北京話為目標。

方言對照國語以林紹賢編的《民衆國語讀本》為代表，這套讀本原是教育部為未入學民衆所編，臺灣版讀本經由林紹賢酌增刪課文後，為臺灣讀者方便使用，加注臺音符號，由行政長官公署出版，算是官方出版品，一共四冊，每冊二十課，右邊注國語注音外，左邊注臺灣音；除了一般課文內容外，並有介紹書信寫法、有房地產等買賣契約格式、有婚喪等等請帖和訃告的格式；針對一般民衆學習國語之用，魏建功說剛來臺時，「我們的女工周來富介紹她的兩個同伴周美玉、廖寶玉來學國語，我請王子和（矩）先生教她們」^[69]而教授她們讀的就是這一套《民衆國語讀本》。

^[68]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69] 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2001）。



圖十三：林紹賢編的《民眾國語讀本》，課文右邊注國語注音，左邊注臺灣音。

但在推行國語過程中，從方言學國語這過程卻一直不太順利，首先面臨到的問題，第一是本省人以當初學日本話的方法去學國語，即以學外國語方式去學國語；第二是本省慣用日語後，方言停滯，沒有吸收新的名詞，以致無法應付現在生活上使用；第三是本省方言這五十年來很少跟其他地方省方言接觸比較，無法把方言和國語系統產出對照關係。^[70]

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來說，更是個重要的分界點。^[71]何義麟指出，戰後初期臺灣人雖曾熱心學國語，國語推行委員會也以臺灣話做為學習國語的媒介，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陳儀與大多數中國來臺知識份子認為，必須更澈底將臺灣人改造為中國人，才能消除臺灣人的反抗。所以在事件的善後處理方面，官方採用激進的文化政策」，「也開始禁止臺灣人使用母語」^[72]。過去國語推行政策以魏建功主張的「實行臺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不用政治力

^[70]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71] 陳志璋，「戰後初期臺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臺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臺北：臺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20。

^[72]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6），頁440。

執行國語運動的方針，面臨轉變；過去推行國語運動不免有路線之爭，但官方機構在二二八事件後，政府對於語言政策轉為剛性，採取壓制政策，而大部分國語讀本的出版，也由官方接手。尤其過去曾榮景一時以方言朗讀的漢文讀本，很快地被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教科書所取代，民間的多元出版漸漸轉由官方機構接手。1946年時國語推行委員會僅編印8種圖書，1947年時增為51種^[73]，以臺灣書店為主的出版，逐漸取代戰後初期多元拼音、中日並陳的時代。

在行政長官公署結束後沒多久，國語推行委員會為實驗從方言學習國語而成立的「示範國語推行所」，也隨著結束，蔡真宜即指出，示範國語推行所的結束，意味著方言學國語實驗不再繼續。^[74]官方研究不再繼續，甚至民間對方言的研究亦其沈寂。^[75]民衆自發性的學習消失，國語運動轉由官方來推動。接著政府遷臺後，戒嚴時期的語言文化成了敏感性的意識型態，制度化後的國語運動，除了推行標準國語外，開始壓抑母語、日語，原本強調從方言學習國語，可以互相對照的方式，澈底揚棄；臺灣省教育廳於1950年訂定「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加強國語運動，同時排除本土語言文化的使用，到1960年代更為全面性，舉凡學校、電影院、運動會、街頭宣傳，以及公眾集會、電影翻譯等都禁止使用日語、方言。^[76]這些措施難免引起民衆的不滿，夏金英在其碩論的結論中即認為民衆反對的並非是國語本身，而是偏差的語言政策和過當的執行方式^[77]，而彼此之間的對立，也不單是光靠貫徹國語運動所能消弭的。

四、國語熱潮的消退

有如旋風過境學習國語的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學習國語的熱情並未持續太久，而成效也並不顯著，以1946年汪彝定初到臺灣時，所見其第一件不便就是語言不通，連文字也不通；當時臺灣人仍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讀漢文。^[78]張光

^[73]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臺灣省教育廳，1948.12），頁52-56。

^[74] 蔡真宜，「臺灣母語教育政策之研究－以閩南語教育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28。

^[75]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1999），頁38。

^[76] 張人傑，〈國語推行運動〉，《臺灣大百科會書》，上網日期：2010.06.30。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66>。

^[77]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162。

^[78]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1991），頁36。汪彝定，1920年生

直回憶，他在1946年12月回臺時的最多感觸是：日本對臺灣最大的影響，是語言上，板橋雖是農村小鎮，但他所聽到的所有中年和青年男人，沒有一個不是在用日語交談的，老年人和多半的女性則說閩南語。^[79]可見1946年底時使用日語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到1947年薛綏之以記者身份來臺時，這種情形仍是相當普遍，以他當時所接觸到的臺灣人，仍幾乎全都講東京式的標準日語。^[80]因此雖然經歷一段學習國語的熱潮，但國語的普及度仍不夠，直到1947年時日語仍是一般使用的語言。

(一)、對社會不滿情緒高漲

國語熱潮持續的時間並不長，而它的消退是有跡可尋的，由報紙社論來看，諸多因素醞釀著社會不滿的情緒，這種情緒最快反映在學習國語的熱情上，李萬居就曾於《國語廣播教本》第三冊〈推薦序〉提到：

今日臺灣政治跟我們的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我們應該知道政治的改良是漸進的，絕非一蹴可就，同時我們作人民的也應該擔負一部分責任，尤其經過大戰破壞後的現階段的臺灣，要由一種制度改變為另一種制度，政治上總免不出現若干弱點，但這是暫時的現象。所以我們倘若用這點理由來做拒絕學習本國的語言和文字，那是一種錯誤，是自暴自棄的行爲。

由上所述這段文字，即可知許多人因對政治的失望，而排斥學習國語，。《民報》形容剛光復之初，臺灣民衆曾陶醉於一個美麗的遠景，但這竟然成爲南柯一夢，「一醒便看見光復的麗花，已經凋殘滿地，在京滬所演的『五子登科』，『三羊開泰』，臺灣何嘗有二致？」^[81]腐化的惡習被帶到臺灣，變成人民深刻的痛苦。「光復當初，臺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爲待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的很，祖國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奮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82]許多社會問題燒熄了學習國語的熱忱，不滿的情緒，即反映在學習國語熱情的消失，《前

於北平，1946年來臺任救濟總署臺灣分署視察。

^[79] 張光直，〈番薯人的故事〉收錄於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臺北：海峽學術，2005），頁81。張光直（1931-2001），生於北平，其父張我軍，1946年隨父返臺。

^[80] 薛綏之，〈替臺灣中學生訴苦〉，《北方雜誌》，7（1947.7），頁52。薛綏之當時爲《北方雜誌》駐臺特約記者。

^[81] 〈歡迎國內記者團〉，《民報》，1946.10.13，1版。

^[82] 〈祖國的懷抱〉，《民報》，1946.10.26，1版。

鋒雜誌》說因為「新的文化無從獲得，再加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他們對於祖國的語言、文字，也失去了學習的熱情。」^[83]由於政治上、經濟上諸多因素，失去了學習的熱情，其中對接收人員的不滿是重要原因。

一開始是普遍對接收人員表現的不滿，《民報》的專欄〈熱言〉，^[84]就經常批判官方的腐敗與臺灣人受壓迫的境遇，例如在1945年11月21日的《民報》：「因接管委員要乘車，買二等車票的乘客，都被驅逐到三等車去。」^[85]而這些點點滴滴不滿的情緒累積，再加上現實生活中由於社會的退步導致民生凋敝，王白淵在1946年2月時形容臺灣社會情形：臺省現在的情形，有許多地方，真是令人寒心。例如教育之退步，治安之不周，工業之停頓，商業之不振，交通之亂脈，行政之不能澈底，均萬人所共認。^[86]

1946年10月時《民報》以〈勸勉學徒諸君〉一文，談到過去那股興奮學國語的情緒，因太多貪污頹廢的作風，冷卻了學習的熱情；而外省來臺的知識份子驕傲的言行，使許多人憤慨之餘，既不再學國語，也不再說國語了：

可是光復未久，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再由許多以不知為己知的糊塗知識階級，大放厥詞，侮蔑臺胞的一種傲氣，把諸君前途的光明擊滅了。於是乎諸君憤慨之餘，國文不高興學了，國語也不高興說了。

雖然如此文中仍勸大家不要因眼前的不快不滿，而不學國語，爲了將來，還是應該學好國語。^[87]

到1946年底時，民衆對派遣來臺人員居多不肖的失望，這種不滿情緒不但沒有消滅，反而更加高漲，民報說出不但冷卻學國語的熱情，還刻意使用日語，表達對社會不滿的情緒：

近來是使用日語的人，感覺著比光復當時更多，而且毫不客氣地，高談闊論。記得日本降服的消息一聲傳到，臺胞們高興之餘，莫不大聲疾呼：不要再講日語了。火車內一聽到日語的聲音，就有問他：你是日本人？也（還是）中國人？受譴問的人，只紅著臉皮，連一句話也不敢回答，是多麼富於感

^[83] 〈國人如此話臺灣〉，《前鋒雜誌》，16（1947.4.20），頁295。

^[84] 〈熱言〉專欄由陳旺成（1888-1979）執筆，署名黃旺成。

^[85] 〈熱言〉，《民報》，1945.11.21，1版。

^[86] 王白淵，〈在臺灣歷史之相剋〉，《政經報》，2：3（1946.2.10），頁7。

^[87] 〈社論·勸勉學徒諸君〉《民報》，1946.10.1，1版。

激的情景！後來看見由祖國派遣來臺各機關人士之居多不肖，遂把親愛變而為厭惡。不特冷了學習國語的熱情，竟故意使用日語於不必用的場合。甚至有主張繼續兼用日文的言論，也許是一種反動的傾向。^[88]

由這類報章報導可以發現，到1946年年底時，因這些不滿的情緒，使民衆對國語的熱情受到影響，反而以說日語成了宣洩不滿情緒的方式；到1947年1月時《民報》更是對這種現象有增無減，表示值得憂慮：

看光復初時，臺胞們滿悅之餘，誰也厭說日語，至於日歌實無從而聽。迨後由內地來的同胞，不肖多於賢達，而又佔了優越的地位，以致臺胞們大形失望，終至內外省人的感情隔膜，日趨深刻。於是反動的，緩和了對日本人的惡感，不客氣地說日語、唱日歌，這是臺灣的實況，很值得憂慮的。^[89]

這種對接收人員的不滿，對社會現況的不滿，讓一般民衆處於回歸的失落與生活的惶恐之中，以說日語、唱日本歌開始緬懷過去；對於知識份子來說，又因廢止日文，直接影響到接受資訊的權利。

(二)、太早廢止日文

太早廢止日文的使用，茲事影響頗大，汪彞定說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都只會使用日文。討論正式問題時也必須使用日語，閩南語只有在家庭和鄉村使用。當時若不許臺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臺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接受資訊，甚至討論問題的權利。^[90]

而長官公署所屬大多數幹部，既不諳日語，亦不通臺語，此一語言上的隔閡，不但影響工作效能，甚或引起各種困難。^[91]

原本就缺乏中文書籍，又太早廢止新聞報紙日文版，影響到一般人的閱讀，因此各界不斷要求這項禁令要延期，花蓮縣參議會即電省參議會，要求向長官公署請求延期實施這項措施，因為「國文程度尚淺」恐有礙政令的宣達。^[92]《新新》第6期〈日文廢止は時期尚早〉：「此無異封本省人之耳目，從青年層到壯年層皆對毫無效率的當局之過度做法，其為怨歎與非難。」接著第7期吳濁流的

[88] 〈熱言〉，《民報》，1946.12.7，1版。

[89] 〈社論·臺灣人要歸那裡去？〉，《民報》，1947.1.21，1版。

[90] 汪彞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彞定回憶錄》（臺北：商周，1991），頁48。

[91] 邵毓麟，《勝利前後》（臺北：傳記文學，1967），頁120。

[92] 〈臺灣國文程度尚淺 要求延期廢日文版〉《臺灣新生報》，1946.9.18，5版。

〈日文廢止に對する管見〉一文，亦表達不滿當局禁止日本語政策；^[93]雖然在各界不斷要求延期下，報紙的日文版仍於1946年10月25日起取消。

另一方面當時許多機關晉用人才，也會以是否說國語當作任用考量標準，將語言問題泛政治化，致使臺灣人失去許多工作機會，洪炎秋當初被朋友推出來參選參政員當候選人，即因為朋友看重他讀過四十年的漢文，又在北平住了二十五年，過的是「國語家庭」的生活，藉他的文才與口才溝通無礙。^[94]吳三連出來競選國大代表時，刊登廣告的即是「國民大會代表，原為代表吾人執行政權之人，除熟悉省況，深通國情及國語以外，尚須具有湛深之學識與圓滿之人格，方能勝任愉快，不辱使命。」^[95]北投國小的陳萬生主任說，在戰後除了參加甄選取得教員甄選合格證書外，同時要取得「光華國語講習所」的中國語合格畢業證書。^[96]任用人員時，以是否會說國語當作任用考量或裁員標準，實在有失公允，《民報》社論對於頗為不平，認為在過度時期，以此為標準會埋沒許多有志青年。^[97]

(三)、國語師資不足

國語熱潮的消退，除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高漲外，國語師資的缺乏，國語又一直缺乏統一的標準，也是重要的原因。

臺灣本來就不是說國語的環境，國語師資只能外聘，雖然有到上海、廈門徵聘，但仍無法滿足各學校的需求，1945年12月時曾委託上海教育局代聘國語教員，資格要求「國內外大學本科，高等師範本科或專科畢業後，有一年以上的教學經驗，說寫流利之國語者」^[98]；到1946年1月臺灣省訓練團又去電：「臺灣省訓練團徵聘國音國語教員多位，以大學出身、曾任高中國語教師、能教注音符號及通閩南語者為合格，待遇從優，旅費另發，請速代登報徵聘逕行赴臺或來榕轉臺。」；同時廈門《江聲報》也刊登臺灣高雄市政府擬聘閩南籍小學教師100名

^[93] 〈日文廢止は時期尚早〉，《新新》，6（1946.8），頁16。吳濁流，〈日文廢止に對する管見〉，《新新》，7（1946.10），頁12。

^[94] 洪炎秋，〈全省行腳叩頭戰敗記〉，《閒人閑話》（臺中市：中央書局，1948），頁1。

^[95] 吳豐山，《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248。

^[96] 蔡麗美，〈北投國小百年校史與社區〉。上網日期：2011.6.30。網址：<http://www.btcc.org.tw/web/91tc/006.doc>。

^[97] 〈社論·為什麼要裁員〉，《民報》，1946.7.11，1版。當此過度時期，登用人才的標準，若過於重視國語國文，以瞭解國語國文的程度而判定其有能無能，則本省許多有為人才難免有向隅之泣，不特埋沒青年有志，也是國家一大損失。

^[98] 《申報》，1945.12.11，2版。

的訊息。^[99]但師資缺乏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嚴重缺乏國語師資，大多數學校原有教師仍不一定通曉國語，所以學校教授用語，仍採用方言，曾一度有參議員提案因國語教師人數不多，擬將臺灣語暫定為教育用語；^[100]但在高雄縣就曾發生問題，學校教員用閩南語方言講授，但學生是客家人不通閩南語，聽起課來非常痛苦。^[101]直到1948年2月時，教育部雖通令各學校各科課程都要用國語教授，^[102]但是仍有許多教員講日語的、講本地話的、講國語的光怪陸離。^[103]在《中華日報》社論中也有提及此現象，「有些國語教師本身國語教不標準，有的是『廣東國語』，有的是『浙江國語』，甚至竟有乾脆拿上海話教國語，使學習者大大地降低了信心。」^[104]鍾肇政即說經歷戰爭前後兩個時代，面對迥然不同的教育環境，戰後完全不懂「北京話」，就連「ㄅㄆㄇ」都搞不清楚。他在戰後一開始用客家話教書，因為剛光復，學校把日本書都丟掉了，但中國字的新書也還沒來，等了一陣子，新書才到。當時老師都不懂北京話，每個學校指派老師去參加講習，參加講習的老師回來就要負責教沒去講習的人，當天學，明天就要教小朋友。^[105]

沒有國語師資外，而國語缺乏可依循的標準，也是學習國語熱潮的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搶購」國語的階段，雖然學得不多，可是已經發現了一個奇蹟，就是彼此所學的國語並不相同。街頭國語教師所傳授的國語姑且不說，學校的內地老師所說的國語也曾經被一個小學生發現有六種（當然他大概僅聽過六位老師講課）；市場上市的國語書籍，有的是用日本假名注音的「北京話」，有的是用四十個注音字母注音並保留入聲的國語。「國語潮」的漸趨平息，這

^[99] 廈門《江聲報》，1946年1月10日載：「臺灣高雄市政府擬聘閩南籍小學教師100名，委託泉州新南書社為申請登記處…。時間：自本月5日起至15日止。有志赴臺從事小教工作者，可檢同證件及2吋半身照片2張前往登記，候輪赴臺。」

^[100] 歐素瑛編，「省參議員提案與詢問，1946.5劉傳來提案」，《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姪》（臺北縣：國史館，2004），頁34。

^[101] 歐素瑛編，「省參議員提案與詢問，1946.5劉兼善議員詢問」，《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姪》（臺北縣：國史館，2004），頁43。

^[102] 〈禁用日語交談先從學生做起〉，《公論報》，1948.2.12，3版。

^[103] 〈為本省學生呼籲〉，《公論報》，1948.3.9，2版。

^[104] 〈國語推行運動的實施〉，《中華日報》，1947.1.26，4版。

^[105] 〈文壇大老回憶杏壇歲月〉，《中國時報》，2010.9.2，A6版。

也是原因之一。他們不再「搶購」，他們要學真正的國語，要標準！^[106]

除了缺乏國語師資外，教材的缺乏與不適用也是退消了這股學習熱。

(四)、中文圖書缺乏

雖然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國語教材，但對於國語一直沒有固定的標準，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以前這階段，所出版的國語讀本有各種標音方式，而民衆學國語的方式也就不一，有把日本人所編的華語課本，改頭換面，用來教學的；有把國音老調，依舊「五聲」，附帶「尖音」，用來教學的；有用東北方言，把平舌葉「ㄆㄅㄇ」併入翹舌葉「ㄆㄅㄇ」的；有用南方話，復把「ㄆㄅㄇ」併入「ㄆㄅㄇ」的；有用所謂「藍青官話」，漫無依據冒然教學的。^[107]據何容形容出版狀況：這些國語書籍大量出版，中國人編的也有，日本人編的也有，通的也有，不通的也有，內容妥善的也有，意識欠妥的也有，依舊標準注音的也有，用假名注音的也有。^[108]國語班的教材，多為臨時編用的，各補習班自行編刻蠟紙鋼版，印刷油印講義，坊間所售讀本也多是錯誤百出，彼此抄襲，造成混亂象。^[109]教育處就曾查到光華報社出版的《國語會話讀本》中注音符號錯誤多達300字之多。^[110]

薛綏之以他來臺觀察到的高中教材為例，臺灣高中用的是正中書局羅香林所編《高中本國史》，材料的龐雜與堆砌，內容是以古文寫的，文字的深奧，內地學生讀起來已夠吃力，臺灣學生簡直視為天書。談到國文和國語，問題更多，一位小學生在作文簿上寫：「國語有六種」，他們很苦惱，不知那位先生的話是道地國語，而每位先生發音有很大的差別。^[111]

後來雖有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作為標準，但此書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倉庫，並未來臺。國語推行委員會把政府歷次公布的國音標準規定彙集起來，編成《國音標準彙編》，由行政長官公署公告全省：「一切注音讀物悉以此書為準」。可是印刷困難，此彙編一直遲到1947年1月才印出來，還是拿到上海印的。在面對不同標準的國語及教材的缺乏，學國語的狂熱逐漸冷卻下來。^[112]

^[106]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2.14，3版。

^[107]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20。

^[108]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11。

^[109]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44。

^[110] 〈教育處注意坊間書籍內容〉，《人民導報》，1946.2.20，4版。

^[111] 薛綏之，〈替臺灣中學生訴苦〉，《北方雜誌》，7（1947.7），頁52。

^[112]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2.14，3版。

許恪士任教育廳長時亦曾談到臺灣缺書問題，表示剛光復時街上的中文書擺滿了《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讀物，這現象一方面表現出閱讀中文圖書的熱忱，另一方面卻反映出書籍供應的缺乏，使得市面上沒有適當的書可讀，後來這種現象雖然有所改善，書局漸多，書籍漸漸豐富，但是由於運輸不便，沒有大量書籍運來，書價太貴，一般民衆根本買不起圖書。^[113]《民報》社論則認為促進臺灣文化：第一要促進我國內地的文化儘量流入，第二要解決紙和印刷費用的暴騰問題，銷路不廣的學術的刊物，沒承印的書店，泛濫在街上的大部分只是那《千字文》、《百家姓》或是「國語學習書」之類而已，此類「刊物之泛濫」，決不是臺灣文化的榮譽，第三要鼓勵臺灣自身的臺灣文化的研究。^[114]但王思翔即說，當時臺灣當局除了比較認真地從事推行中文和國語外，卻竭力限制大陸和臺灣之間的正常往來，尤其是嚴格限制大陸書報的進入，當時大陸省市出版的報紙能在臺灣公開發行的只有《大公報》等少數幾種，還不免常被檢察官所扣押。^[115]何容也在文中說：光復初期市場上流行幾十種國語會話課本，完成了它的時代任務，早已絕跡了。^[116]上海的書商，雖然終於也來到了臺灣，帶來了學術名著，以及黃色書刊，可是需要的書，還是沒有。真正為臺灣人編的書卻往往由於印刷成本的高漲，臺灣所需要的書，編出來，也印不出來，印出來，也由於書價太高，也賣不出去，自上海進口的中文圖書常為外省人自己的需要，無法滿足臺灣人的需要，臺灣年輕男女仍只耽讀日文戀愛小或日文舊雜誌。^[117]這種缺書的情形是一直到1950年代臺灣才漸漸有所改善。

五、結語

戰後初期國語讀本的出現，可以從兩個背景脈絡下作討論，一是出版史，一是國語運動史。在出版史研究中，學習語言的讀本因受限於內容，僅是一種學習的工具書，並不視為特別重要，但戰後這批國語讀本獨特之處，在於它正逢由日文出版轉換為中文出版的過渡期，在印刷上，除了中文印刷字體缺乏外；編排

^[113] 〈本省教育問題，許教育廳長廣播詞〉，《臺灣新生報》，1947.6.22，3版。

^[114] 〈社論·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1946.2.3，1版。

^[115]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頁28。

^[116] 何容，〈本省的國語運動〉，《臺灣教育輔導月刊》（1950.11），頁29。

^[117] 周勻，〈「生根問題」讀後〉，《公論報》，1948.4.19，4版。

上，仍有不少出版品還保留日式排版的型式；而注音符號字體，也是戰後倉促成形的，其排列方式林林總總，不盡相同，有的放在中文字的右側，有的放在中文字的下方，也有排在上方的；而注音符號四聲的標示方式，更有新式、舊式不同的標調方式。從這麼多不同型式的讀本中，正可反映出在這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臺灣成了臺灣、中國、日本三者文化的交會地，而這些讀本所呈現地僅是這不同文化衝擊下的一小區塊。

就整個國語運動史來看，戰後初期的學國語是一段由自發學習，蔚然成風的時期。戰後臺灣人民身分由被殖民者轉換為戰勝者，身分的差異，雖然帶來喜悅，但同時也要面對不同語言文化新的問題，但這似乎並不影響民衆對學國語所發出的熱忱，有的上國語補習班、有的聽廣播教學、也有遇到會講國語的即馬上現學幾句的，因此在工作場合、在市場上、在街巷中都可以看到學國語的人，在社會上成了一股潮流。

配合學國語的潮流，市面上出現的各式各樣讀本，有簡單會話、有文章的閱讀、還有不少參考工具書，其中不少是戰前出版品，各式華語、北京語、漢文讀本又重新拿出來販售，並且在內容上則是盡可能地刪去日本化的痕跡；另一方面，新編輯出版的讀本也在倉促間問世，這些讀本不單只是教授國語，而在內容上往往力求中國化，不斷地強調中國、民族、近代史、抗日史觀、三民主義等，迫不急待的內化讀者，希望一夕之間就能中國化，特別的是這些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讀本，其中不少卻是以日文編訂的。

事實上日語仍是當時通用的語言，在國語尙未普及下，學國語以日語標示是較能符合現實需要，因此配合不同學習者需求，這些讀本在標音上，多是以日文標注、也有以方言音標注國語發音的，當然更多是以注音符號標音的；如此多元的標音方式，正充分展現臺灣多元文化下的新舊交替、兼容並備，只可惜這段時間持續並不長。先是行政長公署太早禁止日文的使用，對於尙不諳中文的民衆來說，無疑是剝奪發表意見、接受資訊的權利，不僅造成生活不便，且以國語問題影響到工作、就業，更是造成一般人的反感。二二八事件後，官方推行剛性的國語運動，除了禁止日語外，方言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原本魏建功、何容推行以方言學習國語的理論，隨著示範國語推行所結束後，戛然而止。使得這些以日文、以方言學習國語的讀本隨著時間的消磨，悄然退出這塊出版場域。

政府遷臺後在獨尊注音符號的戒嚴時期，語言文化更是成了敏感的問題，尤其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全面取消注音符號，改用羅馬拼音進行教學後，注音符號

自此以絕佳的理由排擠掉羅馬拼音，形塑臺灣成了名符其實的「羅馬拼音文盲之島」^[118]，造成日後在翻譯路名時，各類拼音莫衷一是；當母語教學和鄉土教育出現時，又缺乏合適拼音系統；在資訊時代，臺灣特有的注音符號輸入方式，往往又成了無法與國際接軌的瓶頸；原本要經過緩慢醞釀發展的語言文字，在政治力縮壓下揠苗助長，陳其南即說：「如果臺灣有一個自由化的國語政策和國語研究機構，那麼這些不同的語言就會被努力地研究整理、保存和推廣。『國語』並不一定就只限於目前臺灣通行的北京普通話，它應該包括所有存在這個國家和社會內的各種語言傳統。」^[119]那麼目前所遇到拼音問題就可以透過研究機構來解決，而文字、拼音與語言或許就可超越政治，不再成爲意識型態下的爭辯話題。

附表

1945至1946年臺灣出版的國語讀本

| 會話 | | | | | |
|----|----------|-------------|------------|---------|--------------------------------------|
| | 書名 | 編者 | 出版 | 出版時間 | 說明 |
| 1 | 中國語會話教科書 | 中央出版部 | 臺中：中央書局 | 1945 | |
| 2 | 北京官話入門 | | 臺南：三益商事社代銷 | 1945 | |
| 3 | 國語交際會話 | 馬國英 | 臺北：光華出版 | 1945.12 | 大陸出版的國語教科書。 |
| 4 | 國語速會篇 | 楊子瑩 | 臺中：三光書局 | 1945 | 日文解說 |
| 5 | 國語註譯學習讀本 | | | 1945 | 編著、出版者不詳。以日文解說，可能爲戰前出版品，戰後重新出版。 |
| 6 | 國語會話 | 徐榮錦 | 臺北市：華美 | 1945 | 採老式「。」四角標號注音，日文翻譯。 |
| 7 | 國語會話教本 | 國語普及會 | 新民印書館 | 1945 | 日文解說 |
| 8 | 國語會話速成讀習 | 陳清枝 | 陳清枝 | 1945 | 日文解說 |
| 9 | 國語基礎會話 | 宮越健三 杉武夫 | 臺北：臺灣三省堂 | 1946 | 爲翻印書，是戰前學習中國語教科書。作者是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採羅馬拼音。 |
| 10 | 國語會話集 | 臺中州大同會 | 大同書局 | 1945 | 臺中大同會爲普及國語而編。以日文解說，採注音符號標音。 |
| 11 | 國語廣播教本四冊 | 林忠 | 臺北：臺灣實業公司 | 1945 | 日文解說 |

^[118] 余伯泉，〈跨越甲式與乙式拼音的鴻溝：論「通用拼音」〉，《翻譯學研究集刊》，4（1999），頁294。

^[119] 陳其南，〈語言和文化政策〉，《聯合報》，1999.4.12，14版。

| | | | | | |
|-----------|---------------|--------------|--------------------------|--------------------|--|
| 12 | 最新國語教本 | 王真人 | 臺北：大同書局 | 1945.11.2 | |
| 13 | 最新國語教本 基礎編講義編 | 薛瑞麒 | 臺南：崇文書局 | 1945.11.10 1946 | 日文解說。改訂翻印自《北京官話大全》。基礎編以發音、會話為主，採老式「·」四角標號注音。講義編，以介紹基本文法為主。 |
| 14 | 最新國語教本前後編 | | 臺南：三益商事社代銷 | 1945 | |
| 15 | 實用國語會話大全 | | 臺南：三益商事社代銷 | 1945 | |
| 16 | 對譯臺日會話 | 世家書局 | 臺南：世家書局 | 1945 | |
| 17 | 初級國語會話 | | 臺北：臺灣書店 | 1946 | |
| 18 | 初級華語會話 | 東寧書局 | 臺北：東寧書局 | 1946 | |
| 19 | 教科獨修國語會話 | 徐榮錦 | 徐滿古 | 1946 | |
| 20 | 精選時用國語會話 | 南友國語研究會 | 臺南：南友國語研究會 | 1946.1 | |
| 21 | 標準中華國語教科書 初級篇 | 神谷衡平 清水元助 | 臺灣文化印書館 | 1945.10.30 | 此書為翻印本，原書為1923年出版，為戰前日本人學中國語的教科書，作者為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採羅馬拼音。 |
| 22 | 標準國語發音速習表 | | 三益商事社代銷 | 1946 | |
| 23 | 標準國語會話教本 | 張雲鵬 | 張清吉 | 1946 | |
| 讀本 | | | | | |
| 1 | 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讀本 | 高金聲 | 光復印書館 | 1946 | 課文依性質分六種，正風俗、愛國、地理天文等，每種二十課。讀本沒有標注音符號。 |
| 2 | 四書讀本 | 林繼賢 | 益利書店 | 1945 | |
| 3 | 初級國文讀本 八冊 | 蔡哲人 | 嘉義：蘭記書局 | 1945 | 原《初級漢文讀本》。生字沒有注音符號。 |
| 4 | 初級簡易國語作文法 | 魏賢坤 | 臺中：泉安行 | 1945 | 台中自組國語研究會自行編輯。 |
| 5 | 初等國文 四卷 | 新生教育會 | 新生教育會 | 1945 | 與蘭記版《初級國語讀本》相同 |
| 6 | 初等實用漢文讀本 | | 臺中：瑞成書局 | 1945 | 與蘭記版《初級國語讀本》相同。課文重新排版，生字有注音符號。 |
| 7 | 初學必由國文讀本 六卷 | 尤鏡明 | 卷一至四，臺南新盛文書局。卷五、六，源勝製材行。 | 1945 | 與蘭記版《初級國語讀本》相同。傳統漢文讀本，沒有標明發音。 |

| | | | | | |
|-----|---------------------|---------|-------------------|---|---|
| 8 | 民眾國語讀本 | 林紹賢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臺灣書店 | 1946 | 注音符號標國語及方言標註 |
| 9 | 注音符號讀本 | 藍文德 | 臺北：藍文德 | 1946 | 共四十課。全書介紹注音符號發音、拼音等。 |
| 10 | 高級國文讀本 | 黃松軒 | 嘉義：蘭記書局 | 1945 | 原《高級漢文讀本》 |
| 11 | 現代時文讀本前編 | 郭克仁 | 崇文書局 | 1945 | |
| 12 | 速成國文讀本 | 臺中國文普及會 | | 1945 | |
| 13 | 華語自修書 三卷 | 香坂順一 | 臺北：三省堂 | 卷一：1945.11.10 卷二：1946.1.10 卷三：1946.2.15 | 香坂順一戰前任教台北經濟專門學校中國語，此為戰前著作，戰後增補出版。 漢字發音採羅馬拼音、假名注音、注音符號 |
| 14 | 華語新聞の讀み方 基礎篇 解釋篇 | 東寧書局 | 臺北：東寧書局 | 1946 | 包括如何閱讀公文、記事、廣告等。 |
| 15 | 增廣昔時賢文 | 閻錫山講 | 臺中：瑞成書局 | 1945 | 全書24頁。 |
| 16 | 學生必讀國文教科書 | | 高雄：上海書局 | 1945 | 課文內容與蘭記版《初級國文讀》相同。沒有注音符號。 |
| 17 | 獨習華語入門 | | 臺南：三益商事社代銷 | 1945 | |
| 工具書 | | | | | |
| 1 | 中華大字典 | 黃森峰 | 嘉義：蘭記書局 | 1946 | 參考《辭源》，取約1萬字。注音符號仍為舊式四角標號，除注音符號外，尚標直音、音切、聲韻、平仄。 |
| 2 | 日華辭典 | 東方出版社 | 臺北：東方出版社 | 1946 | 注音符號、羅馬拼音標註 |
| 3 | 國臺音萬字典 | 二樹庵、詹鎮卿 | 嘉義：蘭記書局 | 1946 | 注音符號，羅馬拼音。 |
| 4 | 國語發音辭典 | | 臺北：三省堂 | 1946 | |
| 5 | 國語辭典 | 東方出版社 | 臺北：東方出版社 | 1946 | 注音符號、威陀式羅馬拼、日語解釋 |
| 6 | 華語學生辭典 | | 臺北：三省堂 | 1946 | 注音符號、日本假名、日文解說 |

以上資料參考：1.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館藏光復初期臺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資料庫。
2. 《臺灣新生報》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3.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期（2005年10月），頁91。

The Upsurge of learning Mandarin and Mandarin Readings in Taiwan 1945-1946

Sheng-Chi Tsai

Abstract

Taiwan rule by Japanese over 51 years , the use of Japanese have been very popular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public face to the first language conversion problems; was at first look to the motherland and vision, so the enthusiasm reflected in this study Mandarin, the society was the upsurge of learning Mandari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these learners, the market began a variety of Mandarin Reading, learning materials.This paper is discusses the publication of Mandarin Mandarin Reading during this boom period ; thes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1. most of them are Japanese compilation; 2. transcription in different ways ; 3. re-arranging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the popular Chinese Reading ; 4.marrk dialect to learn Mandarin, so many readings are Madarin tone mark by the dialect voice tone. Since many readings are in Japanese and Mandarin or Mandarin and dialects, it is full of diver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a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Keywords (關鍵詞) : Mandarin Campaign ; Mandarin readings ; Multiligual ; Chinese–Japanese Contrast

Sheng-Chi Tsai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E-mail : chi@drng.gov.tw